

撰《朝议大夫赐紫金鱼袋王君镇墓碣》^{〔14〕}可知，曾之谨是朝议大夫王镇的女婿。这些事实，都表明了曾氏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

地域势力不是单一势力，而是多种势力的结合，宗族、宦宦、胥吏、富民、乡绅等等，并且各种身份交织。同时，地域势力又并非仅在一地发生影响，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可以声气相应，相互作用。曾氏家族未见得就比周必大强势，但从周必大的行动来看，他绝对是予以了充分的重视。这种重视，既有现实的需要，更有未来的期许。“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人脉也是一种精神财富。或许对周必大为曾氏家族写作《曾南夫提举文集序》等文章，可以

做如是解读。

结语

以上，以周必大《曾南夫提举文集序》为线索，考察了《宋史》及《宋史翼》均未立传的北宋后期官僚曾安强及其家族的事迹。从曾氏家族的仕途际遇，可以窥测到南宋前夜仕途的艰辛。这种北宋因素，自中期以来开始积淀，至南宋在特殊的背景、特殊的场域之下，终于开始发酵。士人中的多数不再涌向仕途，出现流向多元化的势头。而从曾经贵为宰相的周必大为当地的曾氏家族写下为数不少文字的行为来看，地域势力在当时乡党间的人脉经营相当受到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地域势力的崛起与强盛。

〔参考文献〕

- 〔1〕〔11〕〔12〕〔13〕〔14〕周必大. 周文忠公集〔O〕. 清道光刊本.
- 〔2〕〔清〕雍正江西通志〔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 〔3〕脱脱，等. 宋史：卷294·胥偃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脱脱，等. 宋史：卷313·富弼传〔M〕.
- 〔5〕李壁. 王荆文公诗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6〕徐鹿卿. 清正存稿〔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 〔7〕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題〔M〕. 徐小蛮，顾美华，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苏轼. 东坡全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 〔9〕陈谟. 海桑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 〔10〕何乔新. 椒邱文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科举竞争压力下底层文人的职业选择及其生存境遇

——以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形成为中心

张献忠

〔摘要〕 晚明时期，科举竞争压力的加剧和商业出版的空前繁荣，催生了包括书坊主、编辑、以向书坊提供书稿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作者、抄写工和刻印工等在内的“职业出版人群

〔基金项目〕 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研究”（12CZS02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晚明科举、话语权力与文化场域”（2012T50603）

〔作者简介〕 张献忠，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天津 300191。

体”，给大量不能进入官僚队伍的士人提供了一条谋生的出路，这一群体以底层文人为主，他们的经济状况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书坊主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富足，而大部分职业编辑、职业作者生活条件较差，但他们在社交方面却有着共性——热衷于交游和结社。无论是结社还是其他交游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

〔关键词〕 晚明；科举竞争压力；职业出版人群体；生存境遇

〔中图分类号〕 K24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5) 03-0005-08

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职业出版人群体的形成。这里所说的“职业出版人群体”，包括书坊主、编辑、以向书坊提供书稿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作者、抄写工和刻印工等。

一、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形成的背景

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图书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在由官刻、私刻（又称家刻）和坊刻共同支撑的出版业中，坊刻超过了官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除了传统的出版中心建阳、杭州等地外，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商业出版和图书流通中心，主要有南京、苏州、湖州等，其中仅南京一地万历时期就有150家左右的书坊，北京的坊刻虽然不及上述地区发达，但图书流通却异常活跃。刻印技术有了突破性发展，套印、短版和拱花技术发明并被进一步采用，字体、版式和装帧亦发生了很大变化，图书的外在形态日趋多元化和精致化。出书品种和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俗文史读物、日用类书、蒙学读物和以应对科举考试为导向的举业用书成为商业出版的主打品种。一些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人将创作和编辑图书作为重要的谋生方式，新兴的作者队伍开始形成。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成为商业出版的主要受众，与此同时，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图书受众中士大夫阶层也开始分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趋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①商业出版的繁荣必然催生职业出版人群体的形成。

明代，为了加强社会教化和思想控制，大力发展教育，广建学宫，基层城乡普遍设有社学（除此之外，还有私塾和宗族成立的义学、乡学）；县、府设有县学和府学；南北两京则有国子监。明代放宽了对入学资格的限制，本地官员军民子弟中“端重俊秀者”皆可经童生试进入府州县学。明中后期科举制度也达至鼎盛，学校和科举的发达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求学欲望，由此导致了求学人数的激增，上海县崇祯七年的“应试童生不下二三千人”^①；根据顾炎武的估计，明末全国生员“不下五十万人”。^②求学人数的激增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进一步加大了科举竞争的压力。明中后期虽然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有所增加，但与规模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相比，乡试和会试的录取率却呈逐年递减的趋势，据郭培贵先生统计，“成化至嘉靖年间，乡试录取率平均在3.95%以下，隆庆以后更降至3.1%以下”。^③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士人不能进入官僚队伍，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生员和落第士子为主的底层文人阶层。同时，晚明商业的空前繁荣，造成了士人特别是底层文人的整体贫困化^②，很多底层文人已经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面临生计问题。

对于底层文人来说，除了从事文字工作外，绝大部分都缺乏其他的谋生技能。晚明商业出版的发达为底层文人提供了一个职业选择的空間。

早在南宋时期，在刻书业比较发达的建阳、杭州等地就出现了以经营书坊为业的职业出版人，建阳形成了余氏、刘氏、蔡氏、黄氏等几大刻书世家^③，杭州则以陈起父子的陈宅睦亲坊书籍铺

① 关于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繁荣及新兴受众群体的形成分别参见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0年；《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与文化的下移》，《求是学刊》2013年第2期。

② 关于明代士人整体经济的贫困化，可参见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52-55页。

③ 参见方寿彦《建阳刻书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91-102页。

和鬻书人陈思为代表。据叶德辉《书林清话》等，陈起父子刻书达四十余种^①，陈思则以卖书为主，兼营刻书。他“好古博雅，搜遗访猎，以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沦坠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且售且卖，久而所阅滋多，望之辄能别其真贋”。^②随着书坊的兴起，这些地区出现了职业编辑和以书写、刻印为生的手工业者，建阳就有文人从事专门的编辑工作，如叶棻、俞成、魏庆之、刘仲吉等都曾为建阳书坊做过编辑工作。^③由此可见，南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职业出版人，但尚未形成一个群体，而且主要集中在建阳、杭州等极个别地区。

二、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的构成

（一）书坊主群体

书坊主群体的真正形成是在晚明时期，这一时期，很多商人开始投资于出版业，设坊刻书。徽州休宁富商汪廷讷以经营盐业致富，并做过南京盐课副提举、宁波府同知，后投资于出版业，在南京设坊刻书；徽州歙县吴勉学在广刻医书获利后又“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费费及十万”。^④除了商人投资于刻书业外，一些落第文人、监生、生员乃至普通的儒生也开始设坊刻书。汲古阁主人毛晋“早岁为诸生，有声邑庠，已而入太学，屡试南闱，不得志，乃弃其进士业”^⑤，“刻汲古阁书，风行海内”^⑥，入清后，其子仍以汲古阁为号刻书，刻书总量达六百余种。金溪人周时泰、周文卿、周文炜皆为南京国子监监生，均为南京著名的书坊主。^⑦建阳书坊主余象斗为邵

武县诸生时就亦儒亦商。^⑧钱塘诸生陆云龙困场屋二十余年，遂绝意仕进，与弟人龙设坊刻书，从事商业化写作和出版。^⑨另外，一些普通儒生也设坊刻书，将出版业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寓居金陵的金溪人王世茂就以车书楼为号刻书、校书，并藉此广交士人；王安石第二十二世孙、金溪人王凤翔及其子维鼎长期寓居南京，以光启堂为号刻书，“镌名家文集于金陵，遍行海内”。^⑩

在商业出版大繁荣的背景下，不仅底层文人设坊刻书，一些官宦世家也投资于商业出版，如浙江吴兴的闵氏、凌氏都是仕宦家庭，皆以家族刻书著称。其中较早从事套版印刷的闵齐汲，其父闵一范为万历八年进士。凌濛初的祖父凌约言为嘉靖十九年进士，父凌迪知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历工部郎中，后罢归，“闭户著书，林下三十四年，日校讎群书，雕板行世”。凌濛初则以“副贡生为上海县丞，迁判徐州”^⑪，他除了编选“二拍”等外，还继承家族刻书业，刊刻了大量图书。

晚明时期，南京、苏州、湖州、建阳、杭州等城镇书坊林立，多则上百家，少的也有几十家，由此形成了一个书坊主群体。

（二）职业编辑群体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编辑工作主要是收集、整理和校对文字资料，而且很多时候是编著合一。即使是在印刷术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编辑也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职业。宋代，在商业出版中心建阳等地虽然出现了专职编辑，但由于商

① 参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南宋临安陈氏刻书》，民国二十四年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汇印本。

② 参见方彦寿《建阳刻书史》，121-131页。

③ 赵吉士辑《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引《切庵偶笔》，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909页。

④ 周时泰，字敬竹，以博古堂为号刻书，与南京状元朱之蕃交往密切，以门生自居，朱之蕃对其则以友人称，在《盛明百家诗选》（明万历刻本）序中说“友人周时泰谬相许与，用广梓传，因人成事”。周文卿、周文炜系同父异母兄弟，为刻书家周庭槐之子，周文卿，字以忠，以光霁堂为号刻书；周文炜，字赤之，号如山，又号坦然，系明末清初人周亮工之父，除以光霁堂为号刻书外，还以敬业堂、大业堂为号刻书。目前，仅有三篇涉及周氏世系及其刻书的文章——许振东、宋占茹《明代金陵周氏家族刻书成员及书坊考述》（《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徐振东《17世纪小说书坊主周文炜及其家族刻书活动》（《南开学报》2013年第5期）以及朱天曙《周亮工家世考》（《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秋之卷），皆有误，参见《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行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79年，976-977页。

⑤ 参见方彦寿《建阳刻书史》，286页。

⑥ 参见夏咸淳《陆云龙考略》、胡莲玉《陆云龙生平考述》，分别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4期、2001年第3期。

⑦（乾隆）《乌程县志》卷六《人物》以及乾隆四年刻的胡承谋《湖州府志》卷二十一《人物四》，皆记凌濛初为凌稚隆之子，但清抄本闵宝梁《晟舍镇志》卷六《著述》引《湖录》载凌迪知“晚辑《学海清澜》，未竟而卒，子濛初续成之”，光绪甲辰本《凌氏宗谱》卷八《凌氏谱录》载凌迪知五子，其中凌濛初行四，姑从后说。

业出版的规模还比较小,绝大多数书坊主都是自行承担编辑工作,直到明前期,这种状况都没有改变。

晚明时期,南京、苏州等城市,不仅书坊众多,而且图书出版的规模大、品种丰富,必然需要一批专业化的编辑队伍。从事专职编辑工作的,大都是底层文人,其中有些是生员和监生。明中后期,很多生员久试不第,为维持生计,有些就来到商业出版发达的地区从事编辑工作。王焯、朱鼎臣、吴敬所就是如此。王焯,字次公,号赭玉,繁昌人,由天启四年岁贡任旌德训导,升蒙城教谕,终金山卫教授。^⑧在入监前,王焯曾客居秦淮二十年,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他在《柬程玄度》中说:“落莫王孙,制科不售,种豆屡萁,去作三村学究,又苦肮脏自豪,不趋软熟,为庸酸东道强项门生,作绕指先生,只得驱车执戟而游于梓人,月选文字五千卷,博青蚨数十缗……”^⑨他曾为王世茂的车书楼编选《精选当代明公短札字字珠》《春雪笺》等。郢城生员黄国翰、黄之芳、黄之芬以及宛陵生员刘维诏、豫章府生员等都曾为车书楼做过编辑工作。^①朱鼎臣,字冲怀,临川人^②,长期受雇于建阳书林,编辑有《唐三藏西游释厄传》《三国志史传》《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徐氏铜人针灸全书》《四民便用不求人博览全书》《新刻邝架新裁万宝全书》等。吴敬所,号养纯子,金溪人,长期受雇于南京书坊,编辑有《新镌刘生觅莲记》《新刻公余胜览国色天香》《新刻三妙传》等。

(三) 职业作者群体

两宋以前,由于出版的商业化程度极低,在整个刻书系统中,官刻居于主导地位,且以刻印传统的四部典籍为主,受众也主要是中上层文人

和备考的士子。宋元时期,虽然出版的商业化有了很大发展,坊刻开始兴盛,但书坊仍以刻印传统的四部典籍为主。晚明时期特别是万历以后,商业出版空前繁荣,在建阳、南京、苏州、湖州和杭州等地书坊林立,职业作家群体由此应运而生。除了为书坊做编校工作,晚明时期,很多底层文人还以市场化写作的方式投身于商业出版中,成为职业作家,邓志谟、郭伟、陈台就是以向书坊提供书稿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写手。邓志谟(1559—约启祯年间),字景南,别字明甫、鼎所,号邓百拙生(或百拙、拙生),别号竹溪主人、竹溪散人、风月主人、啸竹主人。^③邓志谟曾长期游闽,在建阳至少二十年左右,以为书坊编纂图书(主要是通俗读物)谋生。他在给朋友的信札中说:“弟自豫章入闽,复自闽归豫章,往返数数。”^⑩又说:“不佞谫谫学,糊口书林,所刻帙,不知殃梨枣、污刻藤几许。”^⑪他编纂的图书有《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精选故事黄眉》《镌音注艺林晋故事白眉》《镌音注艺林唐故事白眉》《镌旁注事类捷录》《新镌近代许旌得道擒蛟铁树记》《镌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镌五代萨真人得道枣记》《镌旁训古事镜》《新刻四六旁训古事苑》《丰韵情书》《新刻一札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梅雪争奇》《蔬果争奇》《童婉争奇》《花鸟争奇》《弄丸集》《镌音注竹溪蝉吟稿》《得愚集》《续得愚集》《释旁释鸡肋集》等。这些图书大都由余氏萃庆堂等建阳书坊刊刻,亦有由南京书坊刊刻者。在与建阳余氏萃庆堂的关系中,邓志谟的身份俨然是萃庆堂的“签约作家”。郭伟也一直致力于商业化写作,不过与邓志谟专注于通俗读物的创作不同,郭伟主要为书坊撰写“高头讲章”(亦即从科举考试的角度阐释四书五经的考试用书)。郭伟,字士

① 见邓茂林辑《车书楼选刻举业必用四六津梁》第一卷卷首题名,明金溪池英俊刻本;阴化阳、苏紫盖辑《四六鸳鸯谱》各卷卷首题名,明崇祯书林吕太汝刻本;刘维昭辑《新刻汇集群书记载大千生鉴》卷一、卷六卷首题名,万历三十一年王世茂车书楼、周时泰博古堂合刻本。

② 学界大都依据朱鼎臣著作的题署“羊城朱鼎臣”误认其为广州人,如沈启无《〈中国小说史略〉校注》(《苦雨斋文丛:沈启无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50页)、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111页)、张兵主编《五百种明清小说博览(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2页)、程国赋《明代坊刊小说稿源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侯忠义主编《神怪小说(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年,35页)等。实际上,这里的羊城乃抚州之古称,又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徐氏铜人针灸全书》,卷端书名下题“豫章古临冲怀朱鼎臣编”、“闽建书林三槐王祐发行”字样,据此可知朱鼎臣系临川人。

③ 关于邓志谟的生卒年和字号,参见吴圣昔《邓志谟乡里、字号、生年探考》(《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邓志谟经历、家境、卒年探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3期)。

俊，一字洙源，晋江人，“年二十四，受聘于三山（福州别称——引者注）余泗泉。始纂《鳌头龙翔集注》并《集注发明》……共八种，海内家传户颂，珍如拱璧。继而流寓金陵，撰著《崇正录》《名公答问》……凡三十七部，金陵泊（当为‘泊’之误——引者注）吴中刘龙岗、刘左山、王履斋、王养虚、刘望台、吴少川、唐龙泉、李少泉、周如溟、唐玉予、龚少冈、王荆岑、晏少溪、周启华、周临岐、张少吾、徐松野、王振华、傅少山、杨君儒等各分梓而行之，一时纸贵。其《四书金丹》，陈仁锡序之，最后成《集注全书》，吴中李光垣、唐际云、杨君儒购阅家板，镂之于三友堂……”^[12]由此可见，郭伟先是受聘于建阳余泗泉，随着其著述的畅销，开始转向金陵、苏州等地，与其合作的书坊亦随之渐多，竟达二十四家。陈台，字鼎侯，江浦人，生员，其弟陈应元在《尚书秘旨·题辞》中说：“伯兄鼎侯与予共一师传，余幸早释褐，伯兄少馁于庠，以坎壤故，肆力于简编……”^[13]可见，陈台系因科场困顿失意才“肆力于简编”的。实际上，陈台的著作如《尚书定符纲目》《四书秘旨》《精铸尚书笥中利试题旨秘诀》（又作《尚书秘旨》）等都是“高头讲章”，也是典型的商业化写作。

在当时的出版人群中，还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文人，不只是从事商业化写作，而且参与图书的策划、编纂或校对，冯梦龙、陈继儒就是如此。冯梦龙撰述、编校、评点的图书达八十余种，大部分是通俗读物，即使是举业用书，也是以应试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冯梦龙还为书商策划选题，很多情况下，他既是作者，又是编辑。陈继儒也是当时的畅销书作家，他编纂和评点的图书达百余种，他还组织一些“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于是眉公之名，倾动寰宇”。^[14]

除了书坊主、编辑和作者群体外，商业出版的发展还需要一支庞大的写刻匠和印制匠队伍。晚明时期，随着商业出版的发展，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从事写刻和印制的手工业者群体，以毛晋汲古阁为例，“汲古阁后有楼九间，多藏书板，楼

下两廊及前后俱为刻书匠所居”^[15]，据其子毛扆所述，仅印匠即达二十人。^①据李国庆先生统计，明代刻印工可考的就达5700余人^[16]，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晚明时期。

三、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的生存境遇

（一）经济境遇

大体来说，书坊主的物质生活相对比较富足，有的甚至是富甲一方的巨贾。汪廷讷以盐商致富后投资于出版业，曾任南京盐提举、宁波同知等职，集官商于一体。汪在家乡建有宏大的环翠堂花园，生活极为奢华，是徽州地区少有的大富商。吴勉学也是徽州地区的富商巨贾，共刊刻书籍300余种、3500余卷，无论是从刻书量还是从“刻资费及十万”来看，其财力之雄厚都可见一斑。汲古阁坊主毛晋雇佣印匠二十余人，“家畜奴婢二千指”^[17]，所刻书板十余万，出版图书近700余种。^②其他像建阳的余象斗以及南京的很多书坊主，从刻书规模看，财力也当非同一般。如南京的周庭槐及其子周文炜、周文卿，周文炜和周文卿皆为监生，其中周文炜系捐资入监。^[18]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书坊主都生活富足，崢霄馆坊主陆云龙的家境就很一般，在《翠娱阁近言》卷首的《自题》中，陆云龙坦言“贫不撤学，贱犹好书”。陆云龙十八岁丧父，“家业中落”，举业上屡试不第使其生活更加困顿，在给友人朱懋三的信中，陆云龙道出了自己“进退竟两无据”的境地：

客岁，妄意一第可芥拾，遂悉置米盐不问，乃柄凿之投，遭刖者三。迨至深秋，犹然一故吾，进退竟两无据，床头之黄与才俱尽，巾中之白随愁并新。门下亲故，秋叶不复作枝头之聚，噫！自非仆惯历世情，空花世境，何以堪此。牛衣泣染，所恃解事儿女子委曲相慰，曰：贾生才而夭，弥生才而杀，贫乃其常，幸存此身，不能作老鹰扬，犹可作老伏生。何自戚戚嗟嗟，更能消几番风雨。^[19]

陆云龙从事出版业主要应当为了补贴家用。由于家境贫困，陆云龙刻书不可能像毛晋、吴勉学等书坊主那样投入巨资，这就限制了其刻书规

① 毛扆在《五经文字》跋中写道：“吾家当日有印书作坊，聚印匠二十人。”转引自杨绍和《楹书隅录初编》卷一，清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本。

② 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收录所刻之书623种，郑德懋辑《汲古阁校刻书目补遗》（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收44种，另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古籍编目员苏晓君《毛晋与汲古阁刻书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6年第3期）考证，至少有数十种书在此两目录中未见著录。

模和盈利能力。陆云龙刊刻的图书中以小品文和部头较小者居多也与此有关,在谈及《皇明十六名家小品》的评选刊刻时,陆云龙对其友丁允和说:“此余竭数年心力,乃今始得。据十六先生之珍奇灵隽而聚之简编……且余贫,度未能行其鸿章大篇于世,姑以其小品行。”⁽²⁰⁾其友人冯元仲亦谈及此,他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序中说:“余友陆雨侯亦贫士也,布衣萧然而好书,日坐屋子下,手不停披……以贫,故不能尽罗邺侯架茂先乘……”⁽²¹⁾杭州另一书坊主徐象榘和焦竑关系密切,“焦先生(竑)怜而欲振之,每出秘藏以资匮乏”⁽²²⁾,由此可见,徐象榘家境也不会太好。

职业编辑和职业作者大都来自底层文人,经济状况普遍不是太好,有的甚至只是勉强糊口度日。王焯是一个贫穷的书生,曾多次参加乡试,“屡科不第”。⁽²³⁾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只身来到千里之外的南京,从事图书编校工作,没有住处,只得栖身于天界寺。他在《又柬陆师》中自称“乡校书村学究面孔”,“其苦如此,稽生懒癖,不喜作书,半其天性,半亦其不给也”。⁽²⁴⁾编辑工作的收入非常微薄,王焯“月选文字五千卷,博青蚨数十缗,不足以了杖头曲蘖”。⁽²⁵⁾虽然王焯从事图书的编校工作,但想出版自己的著作《经书捷解》,却“工费无错”。⁽²⁶⁾邓志谟也是因家境贫困,不得已才“糊口书林”。⁽²⁷⁾据吴圣昔先生考证推测,邓志谟受雇于书林至少十七年。^①大多数情况下,“以糊口计,必岁之暮始归”。⁽²⁸⁾邓志谟的同乡吴还初也是处于社会底层,长期受雇于建阳书林的职业编辑和写手,最后竟客死他乡。邓志谟对于吴还初的境遇深有感触,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吴还初不幸于闽旅棹,亦莫之归,哀哉!此君零落可惜。”⁽²⁹⁾冯梦龙青年时放浪形骸,长期“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³⁰⁾,但后来家道中落,不得不以商业化写作和图书策划及编校为生,有一次甚至到了断粮的境地,靠书商袁于令及时支付报酬才度过危机。⁽³¹⁾虽然职业编辑和职业作者的经济生活普遍在温饱线上下,但也不乏集名利于一身、衣食无忧的职业作者,陈继儒就是其中之一。陈继儒以山人著称,往来于

官宦世家,名满天下,不仅自己编书,还组织“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制造了一部又一部畅销书。

在职业出版人群中,写刻匠和印制匠的经济状况最差,他们的收入非常微薄,清人何东海曾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叶德辉依据心源《韶宋楼藏书志》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所收明嘉靖甲寅张泰刻的《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费贰拾肆两”的牌记,推断“每叶合工费壹钱伍分有奇”,并感叹“其价廉甚”。叶德辉还认为,“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并转引徐康的话说:“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②有学者甚至指出:“当时‘每僧一日饭食腐菜算银一分’。想养家糊口,对刻工来说已属奢望了。”⁽³²⁾

(二) 社交状况

虽然书坊主与职业作者、职业编辑之间在经济状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他们在社交方面却有着共性——热衷于交游和结社。南京的书坊主王世茂交游就非常广泛,而且与状元朱之蕃往来颇多,朱之蕃赞其“博雅嗜古,风流好士,缔交多海内明贤”⁽³³⁾,举人郑文龙亦称其“交游半天下,契洽俱名流”。⁽³⁴⁾南京的另一书坊主周时泰与朱之蕃、叶向高等都有交往。^③明末南京著名书商蔡益所,与复社名流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人都有来往。苏州的书坊主袁无涯和李贽、公安三袁等都交往密切。杭州的书坊主徐象榘与焦竑、唐顺之等频繁往来。大部分职业编辑和作者也喜好交游,前述陈继儒堪称社会活动家;致力于商业化写作的郭伟虽系一介布衣,但与李廷机、苏紫溪、陈仁锡等士大夫名流都有往来^④;邓志谟亦颇喜交游,《得愚集》《续得愚集》收其柬札竟达400封,交游之广由此可见。

晚明文人文人结社之风盛行,职业出版人虽然大都属于底层文人,但同样普遍喜好结社。王世茂由于喜好交游,以其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包括很多作者和编辑在内的社交群体,王焯、刘养聘、虞邦誉等都是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这一群体亦组

① 参见吴圣昔《邓志谟经历、家境、卒年探考》。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民国郎园先生全书本;其中引述徐康之语出自《前尘梦影录》卷下,清光绪二十三年江标刻本。

③ 参见叶向高《苍霞草》卷八《谷城山馆全集序》,明万历刻本。

④ 参见乾隆《泉州府志》(第三册)卷五十四《文苑·郭伟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84页。

织过结社活动。^① 陆云龙、余象斗也都参与结社活动，为陆云龙编选、校订图书的丁允和、何伟然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序中，自称“社弟”，何伟然还称陆云龙为“社伯”^{〔35〕}；余象斗刊刻的《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第二卷卷端题“社友凌云龙校”。冯梦龙曾组织或参加春秋社、韵社。郭伟与李廷机、苏紫溪等人在泉州组织紫云社。^{〔36〕}从邓志谟所编《新刻一札三奇》第一卷卷端“社友淑孟甫毛士翘校”的题署可知，其亦曾参加过结社。

无论是结社还是其他交游活动，其目的都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王世茂之所以拥有丰厚的作者资源^②，并得了“博雅嗜古，风流好士”的美誉，乃在于其“交游半天下，契合俱名流”。正是在“无休止的社会交往”中，王世茂使其社会

资本不断地得以再生产。一些底层文人，虽然生活困顿，但仍热衷于交游结社，经常相约饮酒品茶，游山玩水^③，实际上也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

（三）精神状态

晚明时期，职业编辑和职业作者大都离妻别子，来到商业出版发达的南京、苏州等地，以为书坊写作或编校图书为生，经常居无定所。另外，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科举落第或久试不第者，本来期望所学能“货与帝王家”，但生平不得志，不得已“游于梓人”。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苦闷使其身心皆有一种漂浮无定的感觉。

综上，随着商业出版的空前繁荣，晚明社会出现了“出版人”这一新兴的职业群体，这一群体以底层文人为主。他们的经济、社交和精神活动折射出了晚明底层文人的生存境遇。

（参考文献）

- 〔1〕叶梦珠. 阅世编：卷二，学校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3.
- 〔2〕顾炎武. 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O）. 四部丛刊影印清康熙本.
- 〔3〕郭培贵. 明代科举发展的特征与启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 〔4〕宝刻丛编·序（O）//倪涛. 六艺之一录：卷一百二十六.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17〕陈瑚. 确庵先生文钞：卷五（O）. 清同治九年合肥荆氏刻本.
- 〔6〕东湖汲古阁毛氏世谱（O）. 清道光十九年抄本.
- 〔7〕李光祚. 新刻临川王介甫先生集·序（O）. 明万历刻本.
- 〔8〕繁昌县志：卷十二，人物志·文苑（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影印本：564.
- 〔9〕〔25〕王焯. 束程玄度（O）//王世茂辑. 尺牍争奇：卷二. 明刻本.
- 〔10〕邓志谟. 锲注得愚集：卷五，与陈君国用（M）//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第七辑. 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
- 〔11〕〔27〕邓志谟. 锲旁注续得愚集：卷二，与张淳心文（M）//明清善本小说丛刊：第七辑.
- 〔12〕〔36〕〔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四，文苑·郭伟传（M）. 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84，84.
- 〔13〕陈应元. 尚书秘旨：卷首题辞（O）. 明崇祯初年书林正大经奎璧堂刻本.
- 〔14〕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37.
- 〔15〕钱泳. 履园丛话：卷二十二，汲古阁（O）. 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
- 〔16〕冀叔英. 明代刊工姓名索引·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
- 〔18〕〔清〕程芳等修. 金溪县志：卷四，选举（M）. 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
- 〔19〕陆云龙. 翠娱阁近言：卷三·答朱懋三书（O）. 明崇祯刻本.
- 〔20〕丁允和序（M）//何伟然，丁允和选. 陆云龙评. 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8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137-138.
- 〔21〕冯元仲序（M）//何伟然，丁允和选. 陆云龙评. 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8册. 155.

① 刘养聘曾在给王世茂的信中谈到“中秋前一夕邀同社玩月”（张一中：《尺度争奇》卷1，明刻本），虞邦誉曾作《与社中诸子》（张一中：《尺度争奇》卷5）。

② 王世茂车书楼刊刻、编辑的图书三十余部，参与编选、校对的文人达四十余，其中包括朱之蕃、朱锦、张应泰等知名士大夫。

③ 在王世茂编纂和刊刻的启札类图书以及邓志谟《得愚集》《续得愚集》中有很多相约饮酒品茶、游山玩水，或是吟诗作赋的内容。

- (22) 姚文蔚. 唐荆川先生纂辑武编·序 (O). 明万历曼山馆刻本.
- (23) 王焯. 贺余阿卿社兄中式 (O) //许以忠, 王焯辑. 春雪笺: 卷五. 明万历刻本.
- (24) 王焯. 柬陆师 (M) //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 第53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89.
- (26) 王焯. 柬赵公极 (O) //许以忠汇编. 启牋琅函: 卷六. 明刻本.
- (28) 邓志谟. 锲注得愚集: 卷二·复危君湛宇 (M) //明清善本小说丛刊: 第七辑.
- (29) 邓志谟. 锲注得愚集: 卷二·答余君养谦 (M) //明清善本小说丛刊: 第七辑.
- (30) 王挺. 挽冯梦龙 (O) //陈瑚辑. 离忧集: 上. 民国元年 (1912) 昆山赵氏峭帆楼刻本.
- (31) 褚人获. 坚瓠 (续集): 卷二·西楼记 (O). 清康熙刻本.
- (32) 袁立泽. 变革有成文化传: 中国书史 (M). 台北: 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2000: 204.
- (33) 朱之蕃. 楼汇编皇明四六丛珠·序 (O). 明万历四十八年金陵书坊傅少山刻本.
- (34) 郑文龙. 春雪笺·序 (O). 明刻本.
- (35) 皇明十六家小品·序 (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集部第378册. 143, 148.

平顺与坎坷：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的仕宦生涯

王日根 张 霞

〔摘要〕 明末清初徽州士子赵吉士身处乱世，却并没有改变他读书应举的选择。幽僻的山居环境、和谐的家庭关系、殷实经济条件是其能静心苦读，并顺利走上科考之路的客观前提。进入仕途后，赵吉士担任过知县、户部主事、户科给事中、国子监学正等职，也参与了《大清会典》《赋役全书》等的编修。历数十年的为官经历，或平顺，或坎坷，其中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应看到个人特定经历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明末清初；仕途平顺；仕途坎坷；赵吉士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5) 03-0012-06

甲申之变后，明清易代话题引发了后世学者的诸多讨论。其中，汉族文人士子是一大关注焦点。满清政权的外族身份使以往的研究多从“满

汉对立”出发，进而将“遗民”“贰臣”作为该人群的代名词。^①近年来，学界开始注重考察研究对象的实际处境，力争将其视为全面、完整的个

① 相关成果颇为丰硕，这里仅罗列一二。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杨泽君：《明遗民心态：张岱个案分析》，《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122-125页；孔定芳：《明遗民的身份认同及其符号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3期，121-128页；张玉兴：《明清之际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等。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河海盜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12BZS08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科学通史”（13JJD880010）

〔作者简介〕 王日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霞，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 361005。